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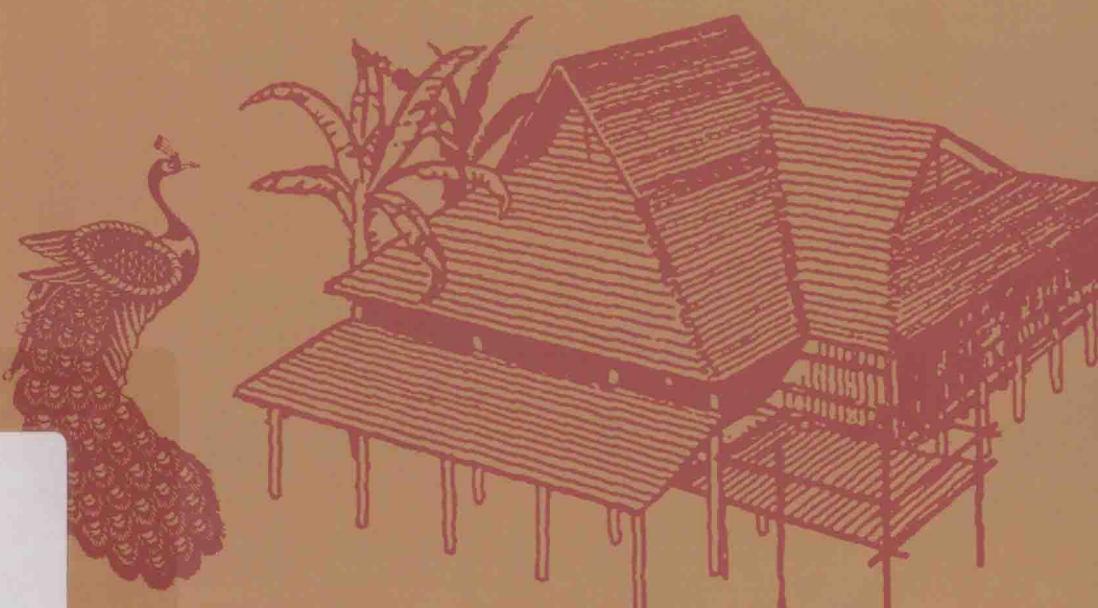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总主编 刘海贵

凤尾竹楼

傣族传播研究

●柳盈莹 著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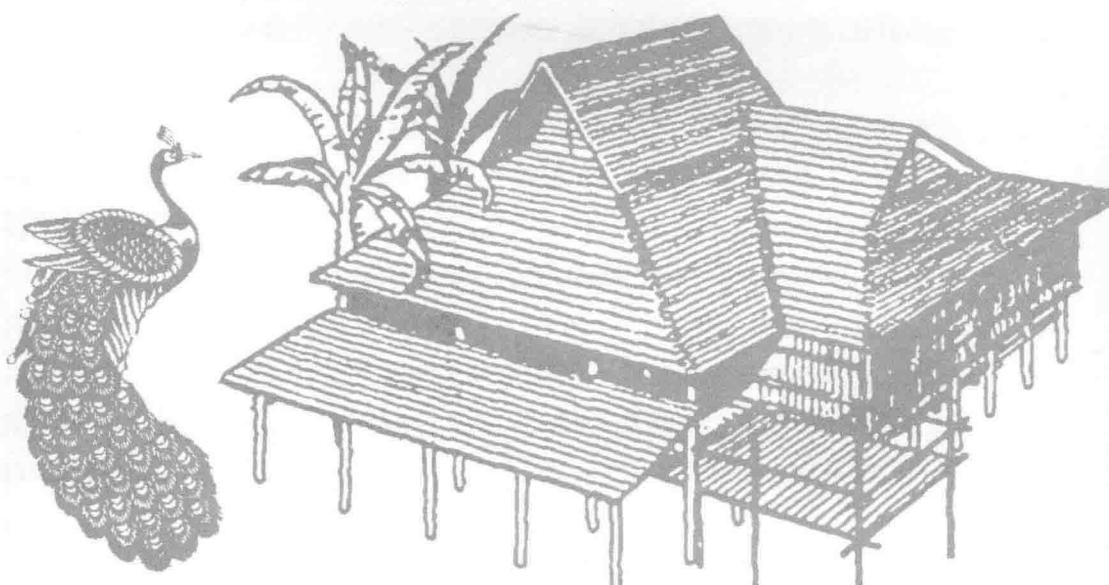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总主编 刘海贵

凤尾竹楼

傣族传播研究

●柳盈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尾竹楼:傣族传播研究/柳盈莹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ISBN 978-7-309-10751-7

I. 凤… II. 柳… III. 傣族-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K285.3②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178 号

凤尾竹楼:傣族传播研究

柳盈莹 著

责任编辑/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95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751-7/K · 481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总序

六年前，新华社有则报道对我触动甚大，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已收藏 180 多套苗族服饰，该馆馆长对到访的我国有关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说：“一百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

是危言耸听还是忠告？我国从事民族文化与传播研究的专家一致认为这是忠告，并纷纷呼吁：要对我国民族文化资源严重流失和民族传播方式急速消亡现象引起高度重视，否则，若干年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将可能只是理论上的或是记忆中的。

三年前，我申请获批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传播历史与趋向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带有抢救性质的研究项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璀璨的文化和独特的民俗，并通过本民族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活动，代代相传，维系着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壮大以及与外界的适应。

所谓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民俗和文化上表现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传播。人类社会发展史充分证明，与民族发展的过程相适应，其传播也经历了一个相应的发展过程：传播媒介由低级向高级、传播方式由简单向多样、传播范围由狭小向宽广。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在于这个民族独特的民俗。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是一种来自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于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



基本力量，它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对族群内部而言，各种民俗符号代代相传，凝聚成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延续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对外而言，民俗符号通常构成反映一个民族历史的“生活相”，是外界认识民族的重要符号，民俗通常也可称作民族的“名片”，如同一提到泼水节，人们便自然想到傣族，提到哭嫁，便自然想到土家族。

民俗形成的过程，本质上应是民俗的传播过程。民俗通过内部的历时性传播即代际传承，以及对外的共时性传播，促使其被认同和接受，最终成为各民族成员共同的约定俗成、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以及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到有关民族和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有令人欣慰的一面，但更有令人隐忧的一面：

令人欣慰的一面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眼下表现为“多元共存”的局面。以媒介变迁的角度看，人类的传播历程迄今一般分为口头、书写、印刷、电子和网络五个阶段，且各阶段之间在较长时间里呈前后相继、交叉重叠的形态。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间，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呈现了多元状态，即本民族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延续、发展，现代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在通过各种渠道被“植入”。例如，人口至今只有三十余万的羌族，原有的文字在西夏亡国后便失传，截至 1992 年，该族信息传播方式还为口头传播，包括羌族史诗、民歌等文化瑰宝，都是通过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口耳相传”。改革开放年代，政府主导羌族文字改革，这种用罗马字标注的“人造”文字影响范围和应用程度虽然十分有限，整理和改革的程度也极其艰难，但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好。这是因为，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在羌族地区日益普及，这是好事，说明历史在进步，但少数民族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传播瑰宝，受到影响和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瑰宝得以更好的整理和传承，是历史给予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机遇和挑战。

令人隐忧的一面是，在民族文化传播生存和发展的背后，尚存在诸多深层次

的问题,如政府对民族文化传播的保护、整理和传承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民俗文化的传承机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等。随着老人的相继离世,许多少数民族的民俗和文化也相继失传。现代的传播手段和舒适的生活,使得较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习惯过一种单一、安逸的生活,他们并不把民族的风俗文化建设与传承当一回事,久而久之,以致本民族的文字不懂、本民族的语言不会,汉化倾向严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新旧共存”、“和谐共生”,是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迫不及待追求的生动愿景。毋庸置疑,经济、科技发展和市场力量等因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与冲击与日俱增,对民族文化传播资源的占有也必然影响到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化消费模式和传播方式,甚至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活动与方式的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传播的发展规律来看,新的传播方式部分改变甚至取代旧的传播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绝不会完全取代。

我们坚信,只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最终实现的一定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罗杰·菲德勒语)的繁荣景观。

刘海贵

2013年5月于复旦

序 言

前苏联学者凯洛夫说：“谁要是没有强烈的感情，他就不会具有强烈的志向，也就不能够热烈地把这个志向体现于事业之上。”

《凤尾竹楼：傣族传播研究》的作者柳盈莹，正是以这种对本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强烈的感情”和对事业“强烈的志向”，用自己的心和血写出了这部学术专著。这部专著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在总结傣族有史以来的文化传播历史、审视当今傣族文化传播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创新观点，展望我国傣民族文化传播美好的发展前景，实为难能可贵！

专著的第一章《信息传播与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大胆地引入了“泛掸民族”的概念，阐述了“泛掸民族”的历史形成：今天的傣族如何从古滇人演变而来；傣泐（又称水傣）、傣那（又称旱傣、汉傣）、傣雅（又称花腰傣）三个傣族支系文化传播的形式及其特征。通过对傣族文化传播史的梳理和分析，作者发现：傣族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其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尽管用于传播傣族文明的各种介质是不断变化的，但它所传递给人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矢志不渝的。

在以下的四章中，作者从政治、宗教、语言、饮食、建筑、生态等方面全面介绍了傣族各个支系的文化传播；傣族与汉族和周边各兄弟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媒介传播方式越来越丰富；傣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及其困境；大众传播与傣族现代化状况调研，其中又分为经验篇、理论篇和愿景篇，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我国傣族当代文化传播的应然之路。最后，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了走进多媒体傣族文化传播时代的景象，利用现代传播方式向全球宣传傣族文化，借助新媒体构建我国傣族信息多向性流通的自由平台，提炼出我国傣族族群文化实



现复兴的本质价值。

全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明确、新颖，主题突出，论证有力，并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说服力强，文字也较生动、简练，不失为研究傣族传播文化的一本好书，也是全国第一本研究傣族传播文化的专著，值得认真一读。

为了写好这本专著，柳盈莹同志用了四年的时间，走访了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保山、红河、玉溪、文山等傣族地区的村村寨寨，向有关专家、学者、记者、民间艺人、章哈（歌手）、摩雅（医生）、波摩（巫师）、僧侶、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老年人等了解傣族有史以来文化传媒发展的情况，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对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傣）族、印度阿萨姆族（即阿洪傣）的文化传媒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可以说她上研究生期间的每一个寒、暑假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对傣族文化传媒的调研上。柳盈莹是个柔弱的傣族女学生，竟有如此强烈的事业心、信心和毅力，这是一般的同龄女子难以相比的。其实，她的事业心、信心和毅力，是来自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

著名诗人艾青有句诗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正因为作者对生她、养她并给予她无限希望的土地，对给予她无限力量和奋进目标的傣族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爱得深沉，加之她又具有这样的事业心、信心和毅力，才使她写出这样有分量、有价值的学术专著。

对于本书的出版，我表示由衷的祝贺！祝愿作者继续努力，“向东边走有好人相助，向西边走有高人指点”，能有第二部、第三部和更多的学术专著和其他研究成果问世！

征 鹏

2014年3月10日

（作者系傣族著名作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政协副主席、西双版纳傣学会会长）

目 录

总序/刘海贵

序言/征 鹏

第一章 绪论	001
一、傣族和中国傣族地区	001
二、研究综述	005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009
四、选题意义及创新之处	010
第二章 信息传播与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013
第一节 “泛掸”族的历史迁徙	013
第二节 我国境内主要傣族支系的文化传播特征	020
第三节 古代传播媒介的演进与傣族民族精神的传承	030
第三章 多元传播方式与傣族社会发展	035
第一节 傣族各领域的文化传播	035
第二节 汉文化在傣族中的广泛传播	084
第三节 信息传播媒介与傣族社会维系	090



第四章 傣族新闻传播事业及其发展困境	102
第一节 傣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概况	102
第二节 傣语新闻媒介发展的现实困境	119
第五章 大众传播与傣族现代化的状况调研	125
第一节 中国傣族地区大众传播接受现状调查	125
第二节 受众媒介接触状况及其对信息的态度	130
第三节 大众媒介与傣族认知的变化	143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傣族传统文化传承	154
第五节 大众传播与傣族现代化	165
第六章 傣族当代传播的发展之路	170
第一节 经验篇：傣族文化传播的历史尝试	170
第二节 理论篇：当代傣族文化传播的开阔思路	181
第三节 愿景篇：走向开放的多媒介傣族文化传播时代	192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5

第一章 絮 论

一、傣族和中国傣族地区

傣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

公元1世纪，汉朝史籍《史记》《汉书》等就出现了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这些书中称其为“滇越”、“越裳”和“僚”或“鸠僚”等；到了唐宋时期，中原的史书又称其为“掸”或“擅”、“金齿”、“黑齿”、“绣脚”或“花蛮”等；而到了元明时期，一些内地的文书把其称作“白夷”、“百夷”、“伯夷”、“棘夷”等。其中，“滇越”，系秦汉时期，中原人对生活在今云南的百越分支的称呼；“僚”等，应该为当时的“中土之人”将傣族先民与壮族先民（即“骆越”或“僚”）相混同，才出现的叫法；“掸”或“擅”，系汉后元前，汉人对“暹罗”（Siam）一词的转写；而至于“摆夷”（即“伯夷”等），疑为来自对傣语中常说到的“来去”的“去”（baii）的译音，在元后逐渐被代为族称使用。

应当说，“Siam”，汉字写作“暹罗”，这是傣族的古称，是旧称；而“Thai”（泰）是今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根据本族人民的自称和意愿，为其正名作“傣族”。实际上，中国境内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的阿萨姆族等在地理上毗邻，语言相近——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国际上以广义的“泰人”作为其通称。

作为古代生活在长江以南的百越族群的一支后裔，傣族至今仍承袭着众多的越人文化。在古越文化的基础上，傣族还广泛地吸收了中原的汉文化、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南半岛（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进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傣族人多聚居在气候炎热、海拔较低且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在中国云南、缅甸东部和泰国北部，这种汉语中称作“坝子”的地方，傣语则一般叫“勐”，指的就是“群山环抱的或河谷中的中小盆地”。除了平坝，傣族也居住在平原上，如泰国的中央平原。傣族的聚居特点是本族聚居的情况较多，较少与其他族群杂居；但近代以来，有部分生活在北方的傣族，曾数度南迁，以及很多其他族群的人大量进入傣族地区，也出现了“傣族不与他族混居的风俗被打破”的情形。

傣族的生活区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大都绿树环绕，附近也多有河流或小溪。在傣族各个村落的中央或山坡上一般坐落有佛寺，佛寺中种有菩提树等南传佛教教徒眼中的“圣树”。还有，傣族的传统民居是干栏式建筑，这是一种上层住人、底层豢养牲畜的双层或多层建筑。此外，在傣族村寨的里外，还生长着榕树、芒果和青竹等树木。

傣族以大米为主粮，特别喜欢吃糯米。每逢节日、“朝仙”（膜拜佛迹）和赕（南传佛教的宗教布施）等活动时，人们最爱吃的美食中，很多便是以糯米为主料做成的。傣族人非常擅长用大米做成各种食物，比如米线、米干（也叫“卷粉”）、凉粉和粑粑等。另外，还有很多的美味佳肴是为傣族所独有的，它们有牛撒撇（凉拌牛杂）、腌牛脚、牛啪甫（傣味炖牛肉）、腌笋、酸辣炒鳝鱼、炸竹虫、炸蚂蚱、煮田螺、凉拌生菜、柠檬牛肉干、酸蚁醋和辣制菌丝，等等。

傣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具体地讲，包括：①语言方面，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它与壮族、侗族等族的语言相近（语法类似、较多词汇一致），有很大的亲缘性；与境外的泰国语及缅甸掸族等族群语相同（语法一致、多数词句的说法完全相同）。在中国，傣语方言比较主要的是有西双版纳傣泐方言和德宏傣那方言两种。②文字方面，在中国境内，现行着多套傣文。这些傣文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最初使用的一批傣文，都是源自巴利文字母（即用来书写南传佛教经书的字母），但由于长期的隔阂，加上各地傣文化的独立演变，使得各地的傣文各不相同。中国境内的数种傣文，可以说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够进行各个傣族地区间的傣文通信。而泰国于约700年前，弃用宗教字母来书写泰族语言，而创制了一套在世俗生活中更易于使用的新文字，这套世俗化的文字，后来被发扬光大并得以流传，成为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一套泰文。



傣族人生性乐天,其民族文化性质也开朗向善。傣族的歌舞、诗歌、传说、雕刻和绘画等艺术或文学作品,其展现方式可谓异彩纷呈,而且其内涵亦非常深刻。这里以舞蹈为例,傣族人的舞蹈种类最常见的有“孔雀舞”、“大象舞”和“象脚鼓舞”等,通过这些舞蹈,傣族向外界传播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气质及审美观念。

每逢泼水节等节日,傣族人都会举办与宗教相关的重大庆典活动,彰显出尤为热情的一面。每值此时,傣族人都会非常欢迎人们参与南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为从四海而来的宾客展示各式各样制作精良的傣族工艺品,并会向他们免费提供牛撒撇米线、竹筒饭和香花粑粑等傣族食品,以及当地四季都产的芒果、香蕉、番木瓜和甘蔗等特色瓜果。

傣族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带有明显的宗教烙印。佛教向印度南方流传,转道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又传到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佛教大约是在西历 12 至 13 世纪开始逐步传入中国傣族地区的,14 世纪时得到广泛传播,到 500 年前基本在滇西南的傣族地区布施开来;布朗、阿昌、德昂等族在傣族的影响下,陆续皈依佛教。因此,傣族的传统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的。

南传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等,有他称蔑之为“小乘佛教”。其之所以称为“上座部佛教”,是因为该派系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的言教和行持,对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进行直接的传承。因为教义中特有指明,需完成“声闻乘”及“缘觉乘”二乘,才能得道成就佛缘,所以南传佛教又有“二乘佛教”的叫法。此外,南传佛教所传诵的三藏经典使用的语言是巴利语,所以也称“巴利语系佛教”。巴利文随南传佛教传入,被傣族接受而用其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记录自己的历史。应当说,正如基督教传入西欧后的结果一样,佛教的传入给傣族带来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字跟文化上的进一步繁荣,傣族人由此在思想上具备了一个由人生观、世界观与宇宙观所组成的完整哲学体系。

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又可分为“摆坝”和“摆孙”两个派系。“摆坝派”,即苦行僧,他们一般选择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修行。这支派别主张通过冥想,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为简单的程度来追求心灵的解脱,摆脱无尽的轮回之苦。现在,在傣



族聚居地区,选择做苦行僧的数量已经较少。“摆孙派”,即选择在城镇或乡村的寺庙中进行修行的僧侣。该派系在傣族地区流传相当广泛,修行者较多。实际上,“摆孙派”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傣族所有宗教信仰者中稳定的主要群体。

佛教的这一派系主张个人接触佛法而自修,因而与北传佛教的修法主张不同。北传教派的主张是,“先成就自己的菩萨思想,还要再以佛心施救于他人”。简单地说,一个终极目的是“觉自”,另一个是“觉他”。南传佛教在对人修法的终极意义的阐释方面,与基督教的新教颇为相似。其核心教义,指明了以下这些思想:首先,通过个人的修法,包含世俗化的修法,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佛业,而不必以自身的佛德再直接去为别人布道施法;其次,个人在此时此刻此地完成了修业,也代表着这个人在彼时彼刻彼地完成了修业,也不必再去普度自身的前生来世;还有,像西方人过圣诞节等世俗化了的宗教性节日,傣族的节庆中也有很多直接跟宗教相关,如泼水节、水灯节和鬼节等;再有,在基督教的新教里,新教徒是可以自由地与神明沟通的,而不必再经过神职人员的传达,而傣族也直接可以跟佛祖释迦牟尼沟通,不必一定经过神职人员,等等。

就具体地从南传佛教在中国傣族地区的践行来看,南传佛教具有其鲜明的“宗教世俗化”的特征。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男子们一般都要在少年时期入寺当和尚。入寺时,由寺庙的佛爷(方丈)举行仪式,剃去头发,披上黄色袈裟。一般来讲,在傣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除了滇中地区不信仰佛教的傣雅(花腰傣)以外,其他地区的傣族男孩到了七八岁的年龄就需要进驻寺庙。小和尚们在寺中接触佛教的经典,学习佛教教规及傣文。经过几年的修行后,他们就能掌握“解脱苦难,积善成德”的本领,进而成为有教化之人。在其成年以后,有些选择还俗成家,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寺庙中深造。还俗之后的傣族和尚,不光可以娶妻生子,也能自由地从事工、农、商等各行各业。

不过,南传佛教在中国傣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意义上的南传佛教,只是以传说中佛在云游之时留下的手、脚印或菩提树、法轮等象征物来对佛陀进行礼拜,并且根据自己的经典而不铸造佛像。但是,在近世因受了北传佛教的某些影响,傣族的佛寺也开始建造佛像。所以,现今中国傣族的佛教,其礼拜的特点就是兼具了佛迹与佛像的双重崇拜。



早在先秦时期,身为傣族前身的滇越人,主要集中居住在今天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之后的岁月里,傣族及其直系先民几乎在今整个云南省范围内的大部分地方都有过定居生活。但“莺飞草长、时光流转”,经过千余年间的多次迁徙,傣族在全球的分布就集中到了泰国、缅甸掸邦、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的滇西及滇南地区(滇中亦有少量分布)。

目前,中国的傣族人口有 110 多万人,主要集中在云南西部及南部的边境一带,即德宏和西双版纳。详尽说来,云南的德宏、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和红河等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傣族定居;而云南其他地方及四川凉山的河谷地带也有少量傣族居住。无论是全球各地主要傣族聚居区的,还是中国各个傣族地区的,其傣文化均有一些差异。在中国境内的各地傣族人,现多以最接近泰国主体文化的西双版纳傣文化为主流,并且现今中国所有傣族地区的傣文化,都有向其归同的强烈趋势。

二、研究综述

单从傣族的人口分布和数量来看,它在今天的中国不算“大族”,但就其历史发展和文明繁荣,以及长期以来与东南亚地区民族的密切交往和深入影响来看,傣族因其民族源流的特殊性及其文化传播史的源远流长,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现代东方政经体系的构建,傣族文化传播的历史与趋势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热点。本文将综合傣族先民的文化传播史,结合相关理论及中国傣族族群的实际,提出我国傣族应该如何以本民族文化适应现代传播的方法。

随着西方文化学者深入东南亚地区,西方人早在 19 世纪就开始对掸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实际上,一些东方国家对此类项目的研究也开展了较长时间。其中最具代表的包括: 1843 年,赛登法登的《泰人》(Seidenfaden, *The Thai People, 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London, 1843*); 1885 年 T. D. 拉古伯里的《掸族发祥地》(T. D. Lacouperie, *Terriern De Lacoupeie: The Cradle of The Shan, London, 1885*); 1893 年,科尔奎豪恩的



《通过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拉旅行记事》(A. R. Acrosschryse Colquhoun, “Being the South China Border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or Shan Empire of Western Yunnan”, *China Review*, Vol. 20, 1893)和拉古伯里的《云南和掸族诸部落研究》(T. D. Lacouperie, “On the Aboriginal and Other Tribes of Yunnan and Shan Country”, *Journal of Antoninst*, Vol. 13)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民族学界对傣族的调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首推上智大学文学部教授白鸟芳郎,他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年版)和《华南文化史研究》(六兴出版1985年版)中有大量涉及傣族语言和民间传说的片段,这些著作是当下为数不多从异域的视角来解读傣族文化,也启示了本文的研究应先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论说傣族的族源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才能深入解释千百年来媒介变迁对整个傣族社会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内傣族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李佛一先生所著的《车里》,第一次全面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风貌;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来研究傣族的书籍,文中以编年体的手法对整个傣族历史的变迁进行详细阐述,能从各个章节发现对应时期傣族及其先民所使用的各种传播媒介;张公瑾的《傣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以论文集的方式对傣族文化的精髓进行深度探讨,为后来的傣族文化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华林的《傣族历史档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分傣文历史档案和汉文历史档案上下两部分,对现存的各类傣文文书、官印、金石铭文和官方汉文傣族文书、官印、石刻和各类傣族照片、崖画和壁画进行归类整理,较为方便后来的研究者能有针对性地找到所需材料;刀承华、蔡荣男合著的《傣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按傣族的建筑、饮食、服饰、婚丧、节庆、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法等文化现象进行分类阐述,并尽力梳理出大致的发展脉络,让人有拨冗取精之感。

这些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与政治学等领域,相形之下,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研究傣族文化则鲜有学者问津。白润生先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